

“一國兩制”在港澳特區的成功實踐及其啟示

吳志良*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先後在香港、澳門莊嚴升起，標誌着中國恢復對港澳兩地行使主權，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港澳的共同願望。這既是中華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港澳回歸後，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政策，分別設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使“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變成生動現實，在過去20多年來取得了成功的實踐。

一、“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

（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提出與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港澳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中央考慮到港澳的歷史和現實，採取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開闢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新途徑。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構想最早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1970年代後期，隨着中美建交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解決台灣問題被提上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九條方針的談話，

* 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逐漸成形。1982年1月，鄧小平先生在接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首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12月，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的規定，國家得在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其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大以法律規定，為“一國兩制”構想的實踐提供了直接的憲法依據。

“一國兩制”是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雖然“一國兩制”的構想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但在實踐中首先被運用到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問題上。中英與中葡兩國通過談判先後在1984年和1987年簽署關於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闡明中國政府在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後的基本方針政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後根據《憲法》，展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提供法律化和制度化的依據，為港澳特區實踐“一國兩制”提供法律保障。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根據《憲法》第31條的規定而採取的特殊地方管理制度。在這套制度下，中央擁有對港澳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管治權，也包括授權港澳特區依法實行中央具有監督權力的高度自治。

中央對港澳特區直接行使的管治權，除了設立港澳特別行政區，以及制定、修改和解釋《基本法》之外，還體現在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決定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支持指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負責管理與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負責管理防務、監督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等。

港澳特區根據“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並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保持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保持財政獨立，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自行制定經濟、文化和社會政策等等，依法充分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港澳兩地的歷史發展、社會結構和制度略有不同，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也顧及到兩地的實際情況，條文上出現了一些差別，

但不妨礙中央對港澳特區行使管治權，以及港澳特區實行的高度自治的大原則。例如，香港作為國際知名的金融和航運中心，在香港《基本法》第五章“經濟”中便需要分為四節，對有關方面作出更詳細的原則性規定。澳門回歸之前已經存在私有土地和葡萄牙後裔居民社群，社會一向注重對歷史文物的保護，在經濟上又以博彩旅遊業為主體等，這些在澳門的《基本法》裡面都有單獨條文加以規定，而香港的《基本法》裡面沒有這些條文。

（二）回歸以來香港各項事業取得的進展

不可否認，回歸後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風波與困難。但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區迎難而上，各項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香港是當今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系之一，一直實行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堅持穩健理財政策和低稅制，講求法治精神，強調行政主導和高效率的公務員體系。所有這些成功要素，在《基本法》內都一一得到了保障。香港回歸祖國22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社會各界人士，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推動各項事業向前發展，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經濟是香港的強項。香港特區自成立以來曾成功應對過兩次國際金融危機，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成果。1997年至2018年，香港的經濟規模增長接近一倍，本地生產總值年均的實質增長率是3.4%，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按港元累計實質增長59.2%。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在2018年位居全球第43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10位，一直維持在發達經濟體的水準。

香港的經濟成就，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來概括。“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意思是：香港是全球第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在《2019世界競爭力年報》中排名第二、是亞洲第三大股票市場、全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在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中》便利營商排名全球第五、是全球第六大銀行中心，以及全球第七大貨物貿易實體。

香港的教育事業在亞太地區也保持領先的地位。教育長期以來佔公共開支的最大部份，2017/2018財政年度達885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3.3%。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策劃的“2015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香港學生在科學、閱讀和數學能力都表現出色，其中閱讀和數學能力表現排名全球第二。在高等教育方面，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位居世界100強大學之列。

在文化和體育事業方面，香港特區政府在2014年公佈第一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有210個主項目和319個次項目，合共480個項目。在這份清單的基礎上，2017年公佈第一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共20個項目，部份項目例如粵劇、涼茶、盂蘭勝會、舞火龍等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香港也在2008年協辦北京奧運馬術比賽專案，並且在2009年主辦第五屆東亞運動會。中國香港體育代表團在奧運會、世界錦標賽和亞洲錦標賽等國際性賽事中屢創佳績。近年來，香港在原有優勢的基礎上，積極開拓廣告、建築、設計、數碼娛樂、電影、印刷出版、電視和音樂等創意產業，通過“創意香港”向初創項目發放資助，推動香港建設成為“亞洲創意之都”。

在醫療方面，香港擁有高質素的醫療系統和非常專業的醫療隊伍。香港的嬰兒死亡率由1997年的千份之4下降至2017年的千份之1.6，是全球嬰兒死亡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是84.7歲，是全球預期壽命最高的地方之一。香港特區政府醫療衛生的開支，在2017/2018財政年度是712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2.7%，其中對公立醫院和診所服務的資助高達97.1%，同時實行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弱勢群體可獲豁免收費。

近年來，香港特區積極發展創新科技。除了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旗艦項目數碼港外，香港科技園工程在2016年已經全部完工，可容納生物醫藥科技、電子、環保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及物料與精密工程行業，同時在各區工業邨提供空間，給創科機構使用。一些頂尖的創科機構，例如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也陸續落戶香港。特區政府在2017年發表的《施政報告》提

出，將從研發資源、吸引人才、提供資金、科研基建、檢視法規、開放資料、帶頭改變採購方法和加強科普教育入手發展創新科技，發展智慧城市，為香港經濟培育新的增長點，帶動香港製造業的“再工業化”。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基礎建設方面一直有大量的投資。在1996/1997財政年度，用於基礎建設的公共開支是233億港元，佔當年本地生產總值1.7%；在2017/2018財政年度，開支已增加至873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的3.3%。除了建成香港迪士尼樂園、亞洲國際博覽館、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和擴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之外，還大力發展連接市區和新市鎮的鐵路網絡，“啟德發展計劃”興建新的郵輪碼頭，“西九文化區”推動文化藝術事業的長遠發展，建設了全球最大的污泥處理廠以及落馬洲河套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當然還有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和口岸人工島等跨境基建工程。在未來10年，香港特區政府將進一步投入超過1萬億港元，用作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中九龍幹線高速公路、公共房屋和醫院發展計劃等。

香港也是連接內地與世界的“超級連絡人”。在2017年，香港特區政府代表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近100次國際會議，另外參加超過1800次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會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也在香港設有代表機構。在專業領域上表現出色的香港居民，更有機會在國家推薦和支持下，競逐和擔任國際組織的重要職位。例如特區政府衛生署原署長陳馮富珍女士，在2006年11月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第一位擔任政府間國際組織最高負責人的中國人。香港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先生，近日也獲得國家提名競逐聯合國駐維也納辦事處總幹事兼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執行主任。

香港的民主政制在回歸後也依法穩步推進。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從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400人增加到現在的1200人。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也不斷增加，自2004年第三屆立法會起，全部議席都經由分區直接選舉或者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已經為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訂定時間表。

（三）回歸以來澳門各項事業取得的進展

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0年的喜慶日子。與回歸前夕的澳門相比，往日經濟衰退、治安不靖，社會人心惶惶的景象早已一去不返，如今的澳門，經濟和社會面貌煥然一新，生機處處，不但印證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科學性，也為國家新時代的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寶貴的經驗。

澳門特區成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歷史性地進行了博彩經營權的分散化改革，結束一百多年來獨家專營的局面，而且在批給條件上引進會議展覽、購物等非博彩元素，作為改善旅遊業服務內容的支撐，加上內地開放居民到港澳地區個人遊的措施，使得澳門經濟自2003年開始錄得較快的增長勢頭。1999年至2018年，澳門的經濟規模增長接近四倍，本地生產總值年均的實質增長率是7.6%，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接近三倍，在全球排名第二，已被國際組織歸類為發達經濟體。

經濟發展除了徹底解決困擾澳門後過渡期的失業問題，使總體失業率從2000年的6.8%的高峰，回落到2018年1.8%，從而達至理論上的“全民就業”。公共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從2000年至2018年間，澳門特區的公共財政收入實質增加了16倍，而2018年的財政盈餘，與2000年相比實質增長323倍，預算開支規模從2000年的129億澳門元（現值226億澳門元），擴張至2018年的1,096億澳門元。

公共財政收入改善，使特區政府更有資源和能力去改善民生，逐漸形成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住房和防災方面的五大長效機制。

早在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已積極投入資源發展教育，通過澳門基金會和教育發展基金，向辦學團體提供資助，重建、擴建或修葺校舍，並添置最新的教學設備。在2018財政年度，特區政府用於教育方面的開支達116億澳門元，佔全部公共開支的14.5%。從2007/2008學年開始，免費教育拓展至整個正規教育階段內的15個年級，同年推動小班教學，在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裡面，每班學生人數都不超過35名。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策劃的“2015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澳門學生科學能力表現排名全球第六。

澳門在發展高等教育方面也取得相當大的進展。公立的澳門大學2009年在廣東省的橫琴島動工興建新的校園，面積是原來氹仔校園的20倍，並且在2013年進駐，大大改善教學和科研環境，提升大學在區域以至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競爭力。至於私立的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和聖若瑟大學等，都在澳門回歸後積極建設本身的校園，為提升本身的教學和科研水準奠定基礎。例如澳門科技大學已晉身海峽兩岸四地50強大學之列，並設有中藥品質研究和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等。近年，澳門特區政府重視優秀人才的培養，不僅由澳門基金會和教育部門發放獎學金，學生不會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升學，人才發展委員會還對澳門社會需要的人才作出全面的檢視和規劃，以配合本身乃至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除了教育之外，澳門特區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投入，通過財富的再分配，使居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切實感受到繁榮、發展和進步為他們帶來的好處。在2018年度，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達到180億澳門元，佔全部公共開支22.4%。政府自2005年開始向永久性居民長者發放“敬老金”，自2008年起推行“現金分享”計劃，向持有澳門特區居民身份證的人士派發現金補助。這項措施對低收入家庭受益最大。澳門特區政府在2008年提出構建雙層式社會保障體系，結合覆蓋全體澳門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通過僱員、僱主和政府三方供款投資的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另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推出了醫療補貼計劃、長者假牙先導計劃、長者免費乘車、學生乘車優惠、學生享用免費的牛奶或豆奶、水電費補貼計劃等措施，從不同方面提升居民的生活水準和素質。

“樂業”的前提是“安居”。為了舒緩居民的住房需求，澳門特區政府在2007年推出建房計劃，興建19,000個公共房屋單位。到2010年，政府加推6,300多個公共房屋單位。經過多年的努力，以低收入住戶為對象的社會房屋的供應問題已經徹底解決；而以優惠價格讓合資格居民購買的經濟房屋，有關的配售手續正在有序進行。長遠來說，澳門房屋的供應，不論是公共房屋還是私人住宅，將可滿足居民在一段時期的需求。“夾心階層”住房問題，也被提上議事日程。

澳門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東西方交流的橋樑，文化形象獨特而鮮明，小城處處可見各式各樣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澳門老城區核心內22座建築和8個廣場前地組成的“澳門歷史城區”，在2005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遺產，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綜合體現。它見證了西方宗教文化在遠東地區的發展，也見證了向西方傳播中國民間宗教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西文化多元共存，是中西生活社區有序的組合，不論過去還是今天，都與居民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密不可分。“澳門歷史城區”榮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是國際社會對澳門在促進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貢獻的一種崇高肯定。另一方面，澳門有8個項目先後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17年公佈的第一批“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共有15個項目，包括南音說唱、魚行醉龍節、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等。

澳門不少的基礎建設在回歸後落成，例如為舉辦大型體育賽事而興建的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還有澳門旅遊塔、西灣大橋、澳門科學館、關閘邊檢大樓、氹仔客運碼頭、輕軌系統，以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人工島等，當然也有各類度假村項目。澳門還是世界上擁有最多五星級酒店的城市之一。國務院在2009年批復澳門特區政府填海350公頃，共五幅地段，主要用作解決居民住房問題和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而離島醫療綜合體、內港擋潮閘、粵澳新通道、連接澳門和氹仔的第四條跨海大橋、大潭山隧道、九澳隧道等項目也正在有序規劃或施工。2016年9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到2030年，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以休閒為核心的世界級旅遊中心，成為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

澳門的民主政制在回歸後也依法穩步推進。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從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200人增加到現在的400人。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席也不斷增加，自2013年第五屆立法會起，經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4人，間接選舉產生的有12人，另外7人由行政長官委任。法制建設也取得一定的進展，例如集中清理澳門原有法規，有關的適應化工作接近完成；市政署在2019年成立，市政機構的代表

得以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滿足了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的有關規定。此外，澳門特區在2009年順利完成對落實《基本法》第23條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工作，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方面起了帶頭和示範的作用。

（四）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出台與落實

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原來歸屬廣東省寶安縣，而澳門則歸屬廣東省的香山縣，所以廣東、香港、澳門三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在經濟、社會民生和文化等領域長期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交流合作。隨着港珠澳大橋的落成通車，珠江兩岸城市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也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在習近平主席的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代表在2017年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正式進入實質規劃階段。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佈，以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增強科技創新、擴大國際合作、提升優質生活、建設內地與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為發展願景。

根據《規劃綱要》，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是大灣區內的中心城市，香港在鞏固現有產業優勢的同時，培育高新科技新興產業，是大灣區中最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澳門在大灣區內的定位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港澳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也必將促進自身的更大發展。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國兩制”內涵在新時期的深化與拓展。

二、“一國兩制”在港澳成功實踐的啟示

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取得成功實踐，本身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初心

“一國兩制”本身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對中央來說是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對港澳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無可避免會遇到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但是，在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向前的過程中，有一個最根本的宗旨，也是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初心，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港澳特區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與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改變，港澳根據國家方針政策，保持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這裡，“一國兩制”得以成功實踐的重點在於彼此尊重對方實施的制度，並互相借鑒成功的經驗，堅決維護《憲法》、《基本法》的權威，堅決維護中央依法對港澳特區行使的監督權，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使國家的根本利益和港澳的整體、長遠利益得到切實的保障。

（二）中央政府對港澳特區的堅定支持

港澳自從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為維護兩地的繁榮穩定提供大量實質性的支持。除了繼續向港澳源源不斷地供應食品、農副產品、食水和能源之外，還有很多事例，當中比較重大和突出的有：支援港澳應對兩次國際金融危機、應對非典疫情、協助澳門處理風災善後工作等；而內地與港澳特區分別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通過零關稅和開放服務貿易准入安排，支持兩地製造業和服務業開拓內地市場，是目前為止內地與境外經濟體商簽開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貿易協定。

中央政府也積極支援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除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之外，又批准香港特區以“中國香港”名義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落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秘書處落戶澳門，建設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開展“中葡合

作發展基金”等具體工作，引導澳門建設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2018年9月1日，內地向合資格港澳居民發放“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使居住在內地的港澳居民享有與內地居民相同的就業、參加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權利，並享用當地的基本公共服務和辦理各項手續。配合各省市自治區對港澳居民在創業、就業、就學方面的優惠安排以至“國民待遇”，祖國內地不但為港澳特區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腹地，更有力地維護港澳的持續繁榮穩定，成就了港澳在國際上競爭的獨特優勢。

（三）培育港澳同胞的家國情懷

港澳與祖國一直同呼吸、共命運。長期以來，港澳同胞關心國家發展，積極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度參與資金、人才、技術和管理的引進。如今，內地依然是港澳商人對外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地。港澳同胞熱心投入內地扶貧、教育、婦女兒童保護等公益事業，而且在內地遭受重大自然災害時，慷慨相助，大力支援搶險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與受災民眾共克時艱，充分展示出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

通過形式多樣的交流、參訪、遊學、軍事訓練等活動，港澳青年對祖國的瞭解日益加深，而內地的高等院校也漸受歡迎，成為他們的升學目的地，報考內地高校的香港學生在2019年達到10,433人，在內地高校就讀的澳門學生目前大約有5,000人左右，其中廣東省的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以及福建省的華僑大學，長期以來為澳門社會培養和輸送大量的專業人才，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和特區的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澳門特區政府在回歸第二年，便提出愛國主義是教育的總目標，全方位推動中華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增強青少年的家國情懷。

港澳回歸祖國後，與台灣的經貿和人員往來更加密切，成為增進海峽兩岸瞭解、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平台。2014年至2018年期間，香港與台灣雙邊貿易每年平均增長率為2.8%。在2018年，台灣是香港第三大交易夥伴，香港是台灣第四大交易夥伴，彼此在對方的出口市場都佔有很重要的位置。香港也是海峽兩岸間接貿易的一個重要轉口港。有關轉口貿易在2018年按年增加了14.9%，總值達4,015

億港元，佔兩地貿易總值約22%。台灣地區是澳門第三大遊客客源市場，是澳門國際機場的最大用戶群。2019年，高雄市市長韓國瑜先生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訪問香港和澳門，除了與港澳行政長官以及中央政府駐港澳特區的聯絡辦公室官員見面外，還以港澳作為跳板，走訪粵港澳大灣區成員城市，港澳在促進兩岸經貿關係、互相學習社會管理經驗、爭取台灣民心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港澳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取得的成功，為制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結語

港澳回歸祖國後，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挑戰，期間，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困難，但任何困難都是暫時的。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港澳居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香港、澳門之所以能在起伏跌宕中站穩腳跟，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中處變不驚，生存發展，正正在於港澳居民一直知道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的初心，正是“一國兩制”堅定了前行的信心，賦予了無窮的力量，使得港澳特區可以繼往開來，使得港澳居民能夠安居樂業，社會得以和諧穩定。

“一國兩制”在港澳能夠成功實踐，在台灣也能做得到。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也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能為促進世界和平正義事業提供有用的借鑒，為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繼續作出本身應有的貢獻。